

## 魏晋隐士皇甫谧的人格特质浅析

徐永富, 武淑梅

(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宁夏 银川 750001;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魏晋之际, 时局暴乱, 政治动荡, 风雨飘摇, 世风浮华, 但皇甫谧却淡泊名利、浸淫书香, 在文哲史医方面都颇有建树。皇甫谧独特的人生体验, 彰显了其卓尔不群的人格特质,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求学特质; 不求做官、但求做事的求用特质; 大胆探索、敢于尝试的求新特质; 主动担当、经世致用的求实特质; 冲破世俗、敢为人先的求进特质。这些特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完美的人格再现, 更为当今社会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注入了激发性的活力。

关键词: 魏晋; 皇甫谧; 人格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44(2016)03-0039-03

皇甫谧(215—282年), 幼名静, 字士安, 自号玄晏先生, 东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 安定朝那(音 Zhū nuó, 系古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居住区地名的音译)人, 在“今宁夏固原东南”<sup>[1]</sup>。皇甫谧生活在三国时期, 当时社会局面混乱不堪, 政治动荡, 经济萎靡, 战乱频发, 尸横遍野, 民弃农业, 流亡逃窜。正如曹操《蒿里行》所言: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sup>[2]</sup>, 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生存环境。三国时期, 世风虚浮, 物欲横流, 人心不古, 众多有识之士惨遭迫害。面对时局, 皇甫谧选择了明哲保身、静心潜学之道, 他博览群书, 研究传统医学, 一生完成以针灸医学为支撑的中医学体系。现已确定的医学著作有 25 部, 他因《针灸甲乙经》而被誉为“世界针灸鼻祖”。在他的医学研究中, 体现了丰富的哲学人文思想和时政见解, 形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的显著特色。因此, 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 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匠和国学大师。纵观皇甫谧一生的显赫成就, 得益于他非凡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

### 一 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求学特质

据《玄晏春秋》记载: “十七年春壬正月乙酉, 予长七尺四寸矣。未通经史, 与从姑子梁柳等, 或编荆为盾, 执杖为戈, 分陈相刺, 有若习兵, 母数谴予”<sup>[3]</sup>。身材高大的皇甫谧带着村童玩嬉习兵的低级游戏,

乡邻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晋书·皇甫谧传》记载: “年二十, 不好学, 游荡无度, 或以为痴”<sup>[4]</sup>。后因其偷瓜孝敬叔母, 而被任氏以“忠孝”为名大义训诫, 叔母流涕。皇甫谧由此受到感化, 内心深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愧疚与震撼, 决心痛改前非, 悔过勤学。他师从乡里人, 勤力不怠, 贪婪读书, 笃学好古, 甚至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的地步, 正如史书记载: “耽玩典籍, 忘寝与食”<sup>[5]</sup>。由于家境窘困, 皇甫谧一边劳作, 一边读书, “沉静寡欲, 始有高尚之志, 以著述为务, 自号玄晏先生”<sup>[6]</sup>。时人谓之“书淫”, 以此不雅的称号以示其如痴如醉的求学状态。从这些记载中, 不难看出皇甫谧的性情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过去游手好闲的行为完全被沉静恭谦的性灵所取代。他有一种超人的坚强毅力, 一旦设定目标就勇往直前。但在其 42 岁时, 不幸身患风痹症(即风湿性关节炎), 在饱受病痛折磨之余, 皇甫谧仍“手不辍卷”<sup>[7]</sup>, 致力于学术研究。皇甫谧博览群书, 通晓医哲文史。西晋泰始四年(268年), 皇甫谧“自表就帝借书, 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 而批阅不怠”<sup>[8]</sup>,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帝赐书”, 在中国历史上一流传为美谈佳话。皇甫谧惜时如金, 废寝忘食, 他读的书可谓汗牛充栋。由此可见, 皇甫谧不畏艰辛, 高洁自守, 其好学的精神难能可贵, 浸淫书香, 潜心钻研。经过岁月的积淀, 从十七岁都未通经史的浪荡

收稿日期: 2016-03-22

基金项目: 2015 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皇甫谧研究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15NXBZS01)

作者简介: 徐永富(1956—), 浙江东阳人, 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研究。

公子转变为皓首穷经、卓尔不群的捻针圣贤，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在虚浮的时代，他坚忍不拔的求学特质犹如一根银针，入刺内壳，于人生大有裨益。

## 二 不求做官、但求做事的求用特质

皇甫谧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族，肩负着重振家业的重任。学识渊博的他受到朝廷的赏识，本可以跃居官场，但他却累征不就，上书谢绝，被人们称为“逸士”或“高士”。曹魏景元元年（260年），国相司马昭征召皇甫谧等<sup>37</sup>人入仕，他上书婉言谢绝。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建立晋朝，晋武帝招贤纳士，唯独皇甫谧托病不出。晋太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多次下诏催逼，皇甫谧却以病为由，上奏拒绝，因其诚恳，晋武帝准其奏。西晋咸宁初年（275年），晋武帝又征他为太子中庶子、议郎、著作郎等，司隶校尉刘毅请任命他为功曹，皇甫谧都不应允。出身名门望族，学富五车的皇甫谧在声名大振之时仍拒不入仕，潜心著述。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险恶，其时天下多变，名人少有保全者，因此他不愿跻身权贵，踏入仕途，选择归隐以明哲保身。皇甫谧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反映了他“世清则仕，世浊则隐”的处世态度。第二，皇甫谧的个人原因，正如《答辛旷书》所言：“疾夺其志，神迷其心”<sup>[9]</sup>，皇甫谧<sup>36</sup>岁得风疾病，<sup>46</sup>岁服寒石散，之后中毒耳聋，百病交加，无力随朝。虽不入仕，但他并非只是简单的回避，而是把归隐与做事相结合。在他看来，生命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前提，纵然死亡对自然有机体的产生和消亡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替代性，但唯有保全性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求为人之道，造福百姓。可见皇甫谧并不拘泥于传统出仕的流俗倾向，而是跳出世俗浮华的权贵视野，用“另类”的审视态度去充实生命之流，这折射出他既远离朝政，回避世俗，蔑视权贵，且又安贫乐道的复杂人格，彰显了他不求做官但求做事，不求名利但求为人，不求喧嚣但求静思的求用特质。正如他自己所表露的那样，自我的一生应该像岐伯、扁鹊一样，抛开仕途，专心致力于读书和钻研医道，以此追求心灵的慰藉，为百姓谋利，不为私利而苟活。

## 三 大胆探索、敢于尝试的求新特质

皇甫谧不仅在针灸方面名扬四海，在史学方面也不乏力作问世。《帝王世纪》是他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作，该著作以魏晋之际丰富的史学资料为基础，采用条分缕析的方法，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更新了许多传统的史料认知，补充了正史之缺，对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首先，从垦田与户口的研究方面来看。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和人口，将这二者视为衡量政权与疆域的重要指标。但是在皇甫谧之前并没有人专门对历代土地和人口状况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皇甫谧“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变动情况进行了统计、比较和分析，反映了社会的治乱和兴衰”<sup>[10]</sup>。皇甫谧针对大禹、周成王、周庄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等七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粗略地勾勒出一条人口、土地变化趋势的示意图，通过数字的变化来反映它们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因此，后代史学家都非常重视皇甫谧的这一研究成果，南朝时期的刘昭和宋元时期的马端临都曾在研究中用到过这份资料，可见这一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从史前史的研究方面来看。司马迁十分重视史前史的研究，但在他撰写的《史记》中以黄帝作为史前史的开端，对于黄帝以前的历史则因难以考证而未加探究。而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着重记述了上起三皇、下迄汉魏的帝王世系，对史前史的研究与司马迁相比，在研究时间的跨度上给予延伸，《帝王世纪》卷一“自开辟至三皇”和卷二“五帝”就是专门记述上古历史的开端，他将伏羲、神农、黄帝视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视为五帝，把中国历史的起源提前了数千年，较之前史学家对三皇五帝世系缺乏系统的整合状况来看，毫无疑问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成果。皇甫谧不仅补述了《史记》中未曾注意到的部分，如三皇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而且也对缺失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三皇五帝的世系、出生地、重大社会活动和部落联盟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和补充，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种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创新人格特质的标志，也正是他求新的人格特质才得以使他不仅能在中医领域成为泰斗级的人物，同时还在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为历代后人所尊崇。

## 四 主动担当、经世致用的求实特质

皇甫谧留给世人丰厚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于他拒不出仕、安贫乐道的外在精神，更在于他敢于担当、经世致用的务实特质，且以疗治伤病、解除疾苦



为己任的悲悯情怀。中国的传统向来推崇学而优则仕,仔细梳理古代文人,不是皓首穷经,奋力跻身官场,便是诗书自娱,遁世隐居。皇甫谧却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例外,在入仕和隐居之外,他找到了一条为百姓谋福祉,同时还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sup>[11]</sup>他认为,如果不精通医道,即便有忠孝之心,面对父母处在危难窘境、百姓遭受困苦之时,也只能手足无措,无法施以援手。这就是先贤要缜密思考,殚精竭虑,耐心探讨医学的缘故。他认为一个人来到世间,若只因自然轮回而获得生命的延续,而缺乏对医学的执着追索,那么自我价值就难以实现,最终只能沦为游魂。中国民间有久病成医的说法,这用在皇甫谧身上最为贴切不过,他不仅在抱病期间仍坚持研读大量的医书,并且还亲自尝试服用寒石散。药物的副作用持续发作,生不如死,但他从未放弃,依然潜心钻研人体结构和病理变异原理,通过科学研究、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在总结当时社会推崇的《素问》《针灸》《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著的理论基础上多次亲身实践,最终摸清了人体的脉络和穴位,并创作了《针灸甲乙经》,历时25年,共12卷128篇。《针灸甲乙经》的问世,标志着古老的针灸术从散杂走向集约,从简便走向精湛。先后传入日本、朝鲜、欧美等地,并被这些国家和地区列为从医者的必读书,由此开启了针灸医学的新时代,标志着针灸医学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奠定了皇甫谧“世界针灸鼻祖”的地位。《针灸甲乙经》在世界针灸医学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人类弥足珍贵的遗产。皇甫谧经世致用、潜心实践的人格特质,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完美的代表,他所开创的务实作风不仅是其塑造灵魂的历练,更是其内心深处求实特质的外化与表征,这种古朴的文人特质依然是当今社会健康人格养成的导向与圭臬。

### 五 冲破世俗、敢为人先的求进特质

魏晋时期政治动荡、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统治阶级生活奢侈,大肆铺张浪费,官僚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统治者更是将随葬品的多寡视为官职高低与财富多少的分层标签,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致使富者破家,贫者举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与当时浮华的世风相比,皇甫谧却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最初在《针灸甲乙经》中

有明确的阐述,之后又在《笃终论》中进一步阐明这种思想,“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sup>[12]</sup>他认为,人死之后,精神和形体分离开来,精神弥散到天空中,遗体则回归土地,融入大自然。并且人的精神是以肉体的存在为基础的,肉体如若消亡,精神自然就会失去依存的躯壳,借此批驳了人死为鬼的世俗迷信理念,同时也批判了厚葬“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sup>[13]</sup>的做法,大力倡导薄葬速葬。皇甫谧在逝世前约八年写了《笃终论》,这是他对自已后事的遗嘱,主要对自己死后的丧事,就墓制、葬仪、祭礼乃至棺材服装等都做了周详而又简朴的安排。他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殓含之物,一皆绝之。”<sup>[14]</sup>“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sup>[15]</sup>谧又言:“若亡有前后,不得移柩。柩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sup>[16]</sup>他明确提出只要《孝经》随葬,其他物件,一律不要,并认为自己的葬式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传统的合葬方式。以此突破传统周礼定制的固化模式,提倡单葬、速葬的做法,是他对后人的真切企盼。

《笃终论》也是向社会发出的改革殡葬旧俗的檄文。皇甫谧逝世后,其子方回和童灵遵其遗嘱而办丧葬,大力提倡丧事简办。不过皇甫谧在遗嘱中本来主张裸葬,但苦于人情习俗由来已久,难以改变,未得照办。皇甫谧的主张与当时贵族的厚葬风潮大相径庭,直接表现了他勇于冲破世俗的阻力,奋力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这便体现了他敢为人先的求进特质。他在封建思想禁锢世俗偏见的窠臼下,奋力打开了一个缺口,独树一帜,这种勇气和超越性的见解,在那个时代实属难能可贵,对现实具有启迪意义。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作为中国古代隐士,穿越千年历史的时空隧道,皇甫谧独特而求新的人格特质将永葆生机、大放光彩。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精神内涵的凸显,又为当今社会在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方面注入了激发性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207.
- [2] 邱英生,高爽.三曹诗译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1.
- [3] 叶长青.中华名医皇甫谧[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378.

(下转第83页)

- 26-36.
- [5] R·H·托尼.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36-137.
- [7]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8-70.
- [8] 伊特韦尔.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四卷[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279.
- [9]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 等,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3-99.

- [10]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 等,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34.
- [11]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 等,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01.
- [12]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21.
- [13] 丹尼尔·J·布尔斯廷. 发现者[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106.
- [14]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86.
- 【责任编辑 芮 芳】

(上接第 38 页)

- [22] 王震中.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6.
- [23] 严文明. 史前考古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56.
- [24] 詹鄞鑫. 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81.
- [25] 井中伟. 我国史前祭祀遗迹初探[J]. 北方文物, 2002(2): 10-14.
- [2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1): 32.
-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4(2): 38.

-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甘肃永靖齐魏家齐家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75(2): 59.
- [29] 郭大顺. 论聚落的层次性——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M]//浙江省文物研究所. 良渚文化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63.
- [30] 郭大顺, 张克举.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发掘报告[J]. 文物, 1984(11): 4.
- [3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 文物, 1986(8): 1-17.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 新石器时代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53.
- 【责任编辑 王 涛】

(上接第 41 页)

- [4] 武跃进, 崔为. 新版医古文导读[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14.
- [5] 武跃进, 崔为. 新版医古文导读[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15.
- [6] 敬香涛. 历代名医传选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92.
- [7] 敬香涛. 历代名医传选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92.
- [8]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0.
- [9] 叶长青. 中华名医皇甫谧[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380.
- [10] 史星海. 中国皇甫谧研究全集[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

- 社, 2005: 268.
- [11] 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全译[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4.
- [12]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2.
- [13]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3.
- [14]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5.
- [15]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5.
- [16] 杨士孝. 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95.
- 【责任编辑 李冬梅】